

拥有长期合法性根基的非农集体经济，至少在相当时期或相当程度上仍需承担社区建设的相关成本，即意味着非农集体经济仍需以“社会经济”形态而存在，并发挥特定作用。总之，珍视非农集体经济“社会性”的培育与维护，是非农集体经济规范化、公平化与效率化发展的关键。

〔责任编辑：冯小双〕

## 乡土社会中的面子观与乡村治理\*

董磊明 郭俊霞

乡村社会的善治不仅依靠国家的制度供给和资源输入，还依赖于乡村社会自身的秩序生产能力，这种内生的秩序生产能力构成了乡村治理的社会底盘。社会底盘的销蚀会导致乡村社会治权的弱化，近 20 年来，农民生计模式与农村社会结构及文化心理的变迁，使得这一问题在一些地方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来。

乡村治理的社会底盘，包括农民的互助合作能力、村庄的道德、伦理的维护机制等诸多方面，农民的面子观是其中重要的一维。当前，农村社会结构正发生巨大变化，农民面子观的表现形态、实质内涵和社会功能也正在发生变化，这对公序良俗的维持乃至乡村社会治理都产生了较大影响。本文试图从村庄社会结构和农民生活实践的角度进入，对农民的面子观进行阐述和探讨。

###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路径

19 世纪末，传教士明恩溥将“爱面子”作为中国人性格的重大特征提出，从此“面子”便引起了学者的重视。西方社会学、人类学家较早开始对中国人的面子观进行学理阐述，思考它对中国人价值和行为的影响。<sup>①</sup>对面子观的系统思考则主要由本土社会心理学家展开。最先对面子作出诠释的是胡先缙，她具体地区分了脸和面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中国农民价值观变迁研究”（项目编号 14BSHO55）的阶段成果。

① E. Goffman, “On Face-Work: An Analysis of Ritual Elements in Social Interaction,” *Psychiatry*, vol. 18, no. 3, 1955, pp. 213-231; Leon E. Stover, “Face” and Verbal Analogues of Interaction in Chinese Culture, Columbia University, Thesis, 1962.

子，并考察了它们的起源；何友晖通过说明面子不是什么，进而澄清面子概念与其他容易混淆的概念之间的区别；金耀基推进了胡先缙的讨论，从方言及其具体意义的角度考察了面子概念；陈之昭和黄光国等则从个人行为和心理层次着手进行探讨。<sup>①</sup> 有学者对此进行了详细梳理，见下表。<sup>②</sup>

学者	界定面子的关键词	面子的定位
胡先缙	社会、成就、承认、声望	声望
何友晖	社交网络、他人、恭敬、服从	恭敬、服从
金耀基	社会阶梯、身份、地位、声望	声望
陈之昭	自我、评价、意义、自我心像	社会尊严、公众心像
黄光国	社会地位、声望、印象整饰、自尊	社会地位、声望

这些研究对“面子”在概念和语词的分析上有所成就。其中有的比较偏重概念探索，将研究重心放在“面子是什么”这个问题上，进行了一些实体主义和本质主义的探究；一些研究还深入到传统中国典籍中去寻求对面子的表达与解释，并观照到史料中所反映的诸多问题，将面子问题与传统文化结合起来认识，这为进一步经验性的研究提供了基础。

不过，这些研究主要是从文化论和社会关系论的角度展开，明显缺乏社会结构的视野。对此，已有学者有所警惕，翟学伟即提出要从中国情理社会的语境去理解面子，<sup>③</sup> 这是试图把经典“大传统”与民间生活的“小传统”勾连起来，以发现作为理念型的大传统在民间社会的多样化实践形态。这种思路对面子观的经验研究有着借鉴意义。但在当前剧烈的社会变迁中，面子观的内涵及其社会功能也在急剧地发展变化，研究者需要克服过快的概念化和抽象化的倾向，需要对面子在村庄社会的作用机制进行具体的揭示。因此，进一步的研究需要有更明确的社会学意识，尤其要注重从农民日常生活实践和村庄社会结构的视野出发。<sup>④</sup> 事实上，一些人类学的研究已经触

① 本土社会心理学方面的论述，可参见《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第 2 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年；杨国枢主编：《中国人的心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年；黄光国主编：《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年；等等。

② 刘继富：《再论面子的界定》，《社会心理科学》2011 年第 2 期。

③ 参见翟学伟：《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社会学研究》2004 年第 5 期；《中国社会中的日常权威——关系与权力的历史社会学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年；《中国人的脸面观——形式主义的心理动因与社会表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年。

④ 吴飞关于农民日常生活中丢脸导致自杀的讨论，已经从这个角度进行了有益尝试。吴飞：《浮生取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八章。

及了这一主题，研究者分析了面子的社会控制及纠纷解决功能，<sup>①</sup> 不过这些研究只是在分析其他问题时顺带涉及，并非对面子观的系统探索。最近几年，我们在经验研究中持续关注了面子问题，<sup>②</sup> 本文是对相关研究的一个系统总结和深化。

首先，我们尝试从农民日常生活实践的角度分析面子观在乡土社会中的具体意涵与形态。其次，我们将面子观纳入村庄社会结构的视野，分析村庄社会结构与农民面子观念之间的互相形塑关系。即本文试图进入农民日常的生活逻辑，从社会结构的角度的来研究面子观，理解农民面子的内涵以及影响面子观的结构因素。文章的落脚点在于面子与村庄社会秩序的关系，它是通过面子的社会治理功能实现的。

## 二、作为“社区性货币”的面子

2004年夏，我们在陕西武功县调研时发现，当地农民还保留着互工建房的习惯。有村民说：“建房时会请邻里村民来帮忙，甚至很多人是不请自到的。这个不仅是省钱的事情，也是相互给面子。我请你来帮忙，说明我拿你不当外人，被我认可，你就很有面子；你们都来帮我的忙，也是给足了我的面子，表明我的人缘好。建房时谁家来的人越多，谁的面子就越大。”由此可见，面子一方面体现了个体之间的互惠关系，具有“人情”的意味；另一方面，又具有社会评价、声望与地位的意涵。这两方面刚好是面子观在村庄生活实践中最核心的内涵。

### （一）个体间的“人情”、“情分”与“互惠”

在乡土社会，村庄社区相对封闭、静止，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世代耕作，生存能力的低下迫使他们不得不通过互助合作来保证彼此的基本生存需求。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大到耕牛，小到桌椅板凳、铁锹锄头、锅碗瓢盆等都可能需要借用；遇到建房、扩大生产、抓药看病、红白喜事等情况，互帮互助更是必需。这种互助合作、互惠行为是别无选择的结果。因此村民间的关系非常亲密，相互期待高，预期长久。尽管由于社区的资源总量有限，生存空间狭小、逼仄，以致这些互动频

① 参见朱晓阳：《罪过与惩罚：小村故事 1931—1997》，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赵旭东：《权力与公正：乡土社会的纠纷解决与权威多元》，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

② 参见陈柏峰：《暴力与秩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杨华：《湘南宗族性村落的面子观》，《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陈柏峰：《村庄生活中的面子及其三层结构》，《广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汪永涛：《作为乡村社会控制手段的“面子”：涵义、特征、运行机制》，《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宋丽娜：《“面子”与村庄权威结构的再造》，《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2009年第6期；陈柏峰：《秋菊的“气”与村长的“面子”》，《山东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度极高的村民经常发生矛盾与冲突，但是为了生存而产生的高依存度又使得村庄内部能产生一套强有力的调节、整合机制来修复摩擦中被损坏的关系。

这种整合机制，不仅包括社区的权威，还包括社区成员所共同服膺的地方性规范，也包括所有成员所共同认可的价值体系和交往原则——乡里乡亲之间必须相互帮助、讲情分，“给面子”当属其中应有之义。

在村庄生活的场域中，这种人情、互惠、面子所建构的村民间的关联和社区整合机制，源于村民的授受之间会产生“给予”与“亏欠”、“权利”和“义务”的关系，并尽可能地维持双方的平衡。由于农民是世代生活在村庄中，因此维持这种授受的平衡也是长期稳定的，并不要求“给予”与“亏欠”、“权利”和“义务”的及时清算、兑现。正是有了村庄生活的长久预期，虽然村民心里都有一本账，但在日常交往中都不大会在利益上过于计较。也正因为此，守望相助的村庄生活往往显得温情脉脉，充满了“人情味”。

当然，村民之间的授受关系有时也会出现失衡。这种失衡不是因为彼此的授受关系没做到绝对的等量，而往往是一方的给予或者回报低于对方的预期。当这种情况发生后，双方关系自然会受损，但是也未必会立刻破裂。可是如果屡次“不给面子”或者“很不给面子”，那么双方很可能就会“撕破面子”，彼此间的互惠、情分就断了。不过也许一段时间后，当事人之间又发生了一些联系，因为生活要继续，大家毕竟生活在同一个村庄里，互相之间躲也躲不开。尽管他们在处理相互之间的关系时可能更加小心翼翼，关系也不太可能再恢复到之前的友好状态，但毕竟恢复了生活联系。于是，围绕着“面子”的“给予”和“亏欠”，“权利”和“义务”也重新进入了每个人心中的“账本”。

此外，村庄生活中，“最不给面子”的情况不是不顾情分，不互惠，而是主动侵犯别人，甚至“打人打脸”。这种“面子”“里子”都扯破的事情一般是村庄中的强势人物所为。不过，这种事情虽然时有发生，但一般人都不敢“把事情做绝”，因为村庄生活是长期的、全方位的，对方的报复、公共舆论的评价，乃至国家法律的制裁都是他们所必须顾忌的因素。

## （二）社会评价、社区声望与地位

在村民的面子“账本”里，不仅记载了他和其他村民个体间的授受关系，还记载了村庄中每个村民面子的“等级评分”。这些又使我们看到，“面子”还指向了社会评价与社区声望。一般来说，对于同一个村民，大伙打出的“等级评分”基本差不多，因为“评分”的标准是全社区通用共享的。这套“评分”的体系主要涉及村民在三个方面的表现：个人的能力、与其他村民交往的情况、在村庄公共事务中的表现。

从个人能力的角度看，在村庄生活的语境中，“日子过得好”的人会得到他人的羡慕和称赞，自然会给自己挣得面子。“日子过得好”不仅是指家庭经济状况较好，

还包括家庭成员关系融洽和谐，子女有出息等。在很多地方，农民把自己的人生任务定义为“盖房子、娶媳妇、生儿子”。在这三个方面的努力过程中，个人由于自己的能力和机缘巧合不同，所取得的结果自然不同，社会评价也因之而异，村民自己就会因此而“挣面子”或“丢面子”。

也有一些人，自家日子过得不错，但村民们对他的评价却并不高，因为他在与村庄其他成员交往中的不良表现让他“掉份子”，降低了他面子的“等级评分”。村庄中的人际交往是“处”的艺术，“处”就是人洞察村庄生活并顾及他人的面子和人情规则的行为和能力。与人为善，做事得体，时常能帮助别人，照顾别人的面子，获得的社会评价自然就高，自己的面子也就足。反之，让人感觉“不好处”，人们往往会对其“敬而远之”，此人也会被社区边缘化，成为不怎么与人交往的“死门死户”。这样的人，自己再有钱，小日子过得再好，在村庄里也没什么面子。

村民在村庄公共生活中的良好表现也是使人能够挣到面子的机会。比如经常帮忙主持红白喜事，公正又高效地进行纠纷调解，积极参与甚至领导村庄公共工程的建设等。如果一个人自家日子过得不错（至少不是很差），又能很好地与其他村民交往，还能经常积极地参与村庄公共事务，并体现出一定的能力，他往往就是这个村子里最有面子的人，换句话说，他就是这个村里的精英与权威，就德高望重，甚至当上村组干部，成为体制性的权威。这样的人因为在村庄中有足够的面子和威望而成为权威；成为权威后，又使自己的“面子”大量增值。在这里，“面子”和“权威身份”的关系相互促进，甚至交融在一起。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不少中西部农村，虽然村干部的报酬和灰色收入都有限，但还是有很多人积极争取获得“权威”的符号和身份，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使自身面子得到增值。同时，“面子”作为一种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也强有力地支撑着权威符号的运作——现在很多村干部都有着同样的抱怨：“我们手头的资源太少了，我们都是靠自己的‘面子’在做工作”。

可见，面子对应的是作为社会人的个体赖以立足并与人交往的“社会性价值”<sup>①</sup>标准，也是这种社会性价值实现后所产生的个体效能感和社会评价。

### （三）面子：一种“社区性货币”

从上述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面子既体现着个体之间的互惠关系，具有“人情”的意味；又具有社会评价、声望与地位的意涵，是社会性价值实现后所产生的

<sup>①</sup> 按照贺雪峰的定义，中国农民的生活价值可以分为本体性价值和社会性价值，本体性价值是关于人的生存的根本性意义的价值，是使人安身立命的价值；而社会性价值是那些在人与人交往层面，受他人评价方面的价值。参见贺雪峰：《农民价值观的类型及相互关系》，《开放时代》2008年第3期。

个体效能感和社会评价。它是个体在具体社区里形成的“印象整饰”，<sup>①</sup>具有“象征资本”的意味，<sup>②</sup>其实质是一种在固定社区内得到公共认可、能够流通、具有公共性价值的“通货”，是一种“社区性货币”。本文之所以使用“社区性货币”而非“象征资本”来概括面子，是由于“象征资本”主要强调了其隐蔽性、转换性与阶层性，这些特性虽然面子也都具备，但我们更希望能借助于“社区性货币”来突出面子嵌入于社会（社区）场域和社会结构之中的特点以及它的可通约性。

在熟人社会里，每个村民都了解其他村民的面子“信用状况”，对其认知与评估也大体相当。因此，面子就像“社区性货币”一样记载在所有村民共享的“公共账本”中。这种“社区性货币”，可由自己长期的与人为善而慢慢积累，也可因诸种不良言行而逐步“消费”殆尽；同时，在变化小、流动少的村庄里，这种“社区性货币”还可以传承给后人，其存量的多寡直接影响着子孙后代的社区声望与社会交往。

因此，在乡土社会的理想类型中，村庄共同体的公共性赋予了面子以公共性，人们积极地在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中进行自我呈现，以获取公众的认可好评，这是“面子货币”的运转基础。同时，熟人社会的竞争性还赋予面子以竞争性。熟人社会信息透明，每个人在“社区面子货币银行”的存款和信用状况，大家都一清二楚。为了获得更多的肯定和赞赏，村民就有挣取“面子货币”的长久动力，“面子货币”才能长久运转和“市场繁荣”。此外，熟人社会的知根知底，又使得人们能较好地平衡“面子”与“里子”、“名”与“实”、“前台”与“后台”的关系，保证了面子这种“社区性货币”不会发生“通胀”或“紧缩”。

“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sup>③</sup>地方性意味着封闭性，意味着开放性程度低，这会使面子这种“社区性货币”有固定的生发场所和流通空间。长久的预期，使得人们不会去挤兑存在“社区银行”中的“面子货币”，这也是无本经营的“社区面子货币银行”可以长久运转的基础。如果社区开放性程度太高，熟悉和亲密势必难以保证，“社区性货币”的生发和流通都会出现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在同一个社区中，人们的面子观具有同构、共通和共享的特征；但在不同地域、不同历史时期，面子所涉及的内容，其权重和排序却不尽相同。之所以农民的面子观存在这种具体的差异，是因为面子深度嵌入于社区社会结构之中，是在具有身份归属（社区认同，阶层属性）的时空坐落中发生作用，面子正是通过身份归属这个中介机制发挥着社会治理的功能。

① 参见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冯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② 参见皮埃尔·布迪厄：《实践感》，蒋梓骅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

③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9页。

### 三、村庄社会结构对面子观的形塑

人们赖以生存的时空坐落<sup>①</sup>就是人们社会化的“社会文化场”，其中蕴含着非常生活化的地方性规范，它弥散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与交往之中，内化为人们的“习性”。面子观的内涵即决定于这种社会性的价值标准、规范与习性；而这一切又由村庄社会结构与外部因素——包括国家大传统、现代社会的市场化力量等——合力形塑而成。

作为一个相对稳定与封闭的社区，村庄社会结构是形塑面子观的主导性甚至决定性力量。村庄的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尤其是社会联结模式决定了人们彼此之间的相互依存度和互动方式，由此形成了与之相应的文化观念与价值体系，即地方性的小传统；具有身份归属感的个体均浸润其中，谙熟、服膺并践行它，以实现自身的社会性价值，获得相应的个体效能感和社会评价。因此，同一社区中的人们有着共同的面子观，面子这种“社区性货币”便有了通约的社会基础。

由于农民面子观受到村庄社会结构的形塑，中国农村社会又具有很强的非均衡性，这使各地的面子观呈现出不同的具体样态。

以房屋建设为例。在河南安阳农村，住房竞争非常激烈。大部分农户的住房都十分宽敞高大，甚至装修豪华。那些还没有能力建房的村民也一直在为建房而积蓄财力。大部分村民都是在攒到了建房所需钱款的一半到三分之二时，就开始东借西凑准备动工。在他们看来，房子最关乎面子：盖了房子能让自己进入村庄主流社会的竞争，能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为了建新房，村民尽量缩减其他方面的消费，不仅饮食极其简陋，甚至还有人几年停止用电。这一切在当地都是可以理解的：“吃是个人的事情，房子是给别人看的”；“大吃大喝是不会过日子，没有建房子，谁知道你有多少钱？”这种“死要面子而不顾里子”的情况在整个华北平原都很普遍。

在赣南客家人聚居的农村，建房也同样关涉面子，但却与安阳农村有所不同。挣足了钱建一栋漂亮的房子，自然是很有面子的事；但如果没有足够的钱，要借钱建房子，就会被人评论为“打肿脸充胖子”，反而会丢面子；如果为了建房子，舍不得吃喝，那就是彻底没有面子了。至于用偷、骗、抢、卖淫来的钱盖房子，更会为人不耻。显然，当地村民面子的评价体系包括了生活的全方位：不仅涉及日常的衣食住行，还涉及个人的道德与品行；在这种面子观的影响下，“名实分离”的情况基本不会发生——没有“里子”的人，怎么折腾也是难“秀”出面子的。

而在湖北荆门农村，住房几乎完全和面子无关。荆门农民的收入水平和日常生活质量整体上要高于大多数的华北农村，但是，农民的住房却普遍“简陋破败”，很

<sup>①</sup> 在本文的语境中指村庄社区。

多村庄中最近十多年来建成的新房屈指可数。对于他们而言，房子够住、能住就行了，建一栋宽大漂亮但超出实际用途的住房不仅不可能带来“面子”，相反却可能会被人嘲讽为“神经病”。另一个与华北农民相反的评价标准是对饮食的态度，荆门农民非常在意饮食，绝大多数人家每顿都不会少于三四个菜，而且几乎天天见荤。显然，荆门人更注重享受生活，更注重“里子”而不在意“虚”面子。

对上述面子观的差异，我们需要进入村庄社会结构的内部加以分析理解。我们将主要从农民社会关联的模式，或者说血缘地缘的联结模式上去把握村庄的社会结构。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是中国农村中两种基本的联结纽带，不同的地区会呈现出不同的联结模式，我们依此大致划分出三种理想类型：血缘主导型社区，地缘主导型社区，血缘+地缘混合型社区。<sup>①</sup>

在血缘主导型社区中，血缘边界与地缘边界基本重合。一个自然村往往就是一个宗族，村庄社区中具有较强的地方性规范、宗族组织和社区权威，尽管宗族中又会分为若干部支，但同时更有一套超越的，近乎笼罩性的力量规约成员，整合社区。这类社区主要分布在南方的江西、福建、广东等地。这些地区的村庄往往历史悠久，宗族规范高度内化，宗族意识形态强劲。虽然遇到现代性冲击，但至今仍有较强的生命力，村庄内形成了单姓的血缘结构。

在血缘+地缘混合型社区中，一个社区往往存在若干个家族组织。每个家族组织内部团结紧密；尽管这些家族可能同根同源，但彼此之间存在较为激烈的竞争关系，且村庄社区中往往没有一个原生的超越性力量来协调、整合。该类型主要分布在华北平原、黄土高原等地区。这些地区为中央政权力量可及之处，未能在村庄内形成单姓的强宗大族。由于村庄边界未能完全封闭，偶尔有移民进入，因而大多形成了多姓聚居的血缘+地缘格局，血缘基础上的家族结构，依附于地缘关系，在地缘关系之内发挥作用，村庄内有多元力量并存。

而在地缘主导型社区中，基本不存在前两个类型里那种以血缘为纽带而形成的强有力的家族、宗族组织。社区由很多规模不大的杂姓组成，处于原子化的分散状态，没有一套强有力的原生性组织权威和地方性规范。这类村庄的历史一般比较短，处于清代以降的移民地区，典型的如东北地区、江汉平原。这些地区开发时间短，不断有移民进入，地方性规范比较弱。村庄没有形成强大的宗族结构，也没有形成两个或多个血缘集团共存的结构，而是形成了血缘关系不凸显的地缘结构。

<sup>①</sup> 这种划分主要受贺雪峰和宋丽娜相关研究成果的启发。贺雪峰最早根据区域差异将中国农村从宏观上划分为南方、中部、北方三大区域（参见贺雪峰：《村治模式：若干案例研究》，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后来又具体概括为团结型、分裂型、分散型三种类型（参见贺雪峰：《论中国农村的区域差异》，《开放时代》2012年第10期）；而宋丽娜则依据不同的社会联结模式对农村人情问题展开了研究（参见宋丽娜：《人情的社会基础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华中科技大学，2011年）。

社会联结模式的不同使得村庄的社会性质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如村庄共同体的价值生产能力、地方性规范对村民的制约强度、村民间认同与集体行动的主导性边界、村民的生活面向等方面。而不同的村庄社会性质又形塑了各地村民不同的意义世界、价值观、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从而使得面子观呈现出不同的具体样态。

在血缘主导型社区，村民间认同与集体行动的主导性边界是宗族组织。村庄社区是一个高度整合的共同体，有着很强的内聚力和价值生产能力，具有一套强有力的地方性规范。村民的生活面向在村庄之内，村庄共同体的价值体系和地方性规范对每个人的规约是全方位的：无论是安身立命之道，还是社会交往之道；无论是面子的获得之道，还是里子的维持之道。在这个立体、全景式的控制体系下，村民们基本都能有序地参与社会交往和社会竞争，并从中获得自己相应的成就和社会评价。此外，由于村庄共同体有着很强的公共性，村民会力所能及地参与公共生活并从中获得相应的声望与评价。因之，村民主流的面子观具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匹配于“向内用力的人生”，克己自强，既具有自省的精神又具有进取的意识，面子涉及生活的全方位，且注重面子和里子“名实兼具”；二是村民在村庄公共生活中的良好表现能成为面子的重要来源；三是面子的获取与竞争基本正当有序，较少出现异化。

在血缘+地缘混合型社区，存在着若干分裂的竞争性家族。其对内合作、对外抗御的认同与行动单位，一般以五服内的兄弟、堂兄弟为基础构成，规模大约十余户至数十户。这样的村庄中，村民的生活面向也在村庄之内，村庄也具有较强的价值生产能力和地方性规范。但是，由于家族之间存在强烈的竞争关系，村庄中无法发育出强有力的超越性的权威力量来平衡社会竞争，因此面子的竞争就显得格外激烈。由于总体的资源稀缺，人们更注重在具有仪式和象征意义的生活面向上的竞争，如建房、红白喜事等，竞争胜利了，便在气势上压住了别人，否则就似乎被“一票否决”了。为了能赢得足够的面子和社区地位，人们往往不得不“打肿脸充胖子”。另外，村民也会较为积极地参与公共生活以获得面子，而在社区性的公共生活中所获得的面子不仅是自己的，而且还是全家族的。所以在这样的村庄里，个人的面子和家族的面子叠加在一起，往往会使得村庄政治的斗争异常复杂。在这种理想类型中，面子观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具有仪式和象征意义的生活面向上的竞争是关键点，为了面子可以不顾“里子”，“名实分离”；第二点是面子的竞争非常激烈，时常会出现异化；三是村民会比较积极地参与社区性、竞争性的公共生活。

而在地缘主导型社区，人们对宗亲关系没有多少心理上的认同。兄弟分家后界限分明、各行其是，在核心家庭以上不再有主导的基本认同和行动单位，村民之间的关系呈现出原子化趋势。村民的生活面向在村庄之外，对村庄难有长远的预期。精英分子不屑于村庄内部的面子竞争，而将自己的生活世界转移到村庄之外。这种类型的村庄，缺乏内聚力和价值生产能力，也无法产生出一套强有力的社区规范。虽然人们仍然会关注个人的效能感和社会评价，但是它们却是指向于在即时性的享

乐和获得实惠中获得成就感，收获别人的羡慕——而在前两种类型社区中，这些可能是会被评价为“不要脸”。此外，由于村庄的公共性较弱，村民因此会较少通过积极参与公共生活而获得面子。在地缘主导型的理想类型中，人们相对来说更多的是秉持“向外用力的人生”，其面子观的特征是：一是面子主要关涉即时的享乐和实惠的获取，“重实轻名”。二是许多评价标准有别于传统价值规范，传统道德评判的权重大大下降，克己谦让、内敛自省、勤俭刻苦不仅得不到褒扬，反而可能被耻笑为无能。三是公共规则对村民的控制力较弱，村民不太在意在公共生活中的表现与面子，甚至可能为了私利而不顾社会评价，退出村庄的主流评价，自外于村庄面子竞争系统。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大致可以看出村庄社会的联结模式这种结构性因素，是通过什么样的机制和逻辑形塑着面子观，详见下表：

村庄类型	村庄结构外形	村庄社会关联	典型地区	面子观的特征
血缘主导型村庄	单一宗族	团结型	华南地区	名实兼具，面子竞争有序，较少异化
血缘+地缘混合型村庄	多个小家族集团	分裂型	华北平原	名实分离，面子竞争激烈，常见异化
地缘主导型村庄	原子化的家庭	分散型	江汉平原	重实轻名，道德意涵低，可退出面子竞争

#### 四、社会结构变迁与面子观的嬗变

近 20 多年来，中国农村处于快速的变迁之中，伴随着农民的大规模流动，村庄边界开放，市场化因素的进入，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农民的面子观以及它对村庄秩序的维持功能也随之发生变化，甚至出现了面子指向性的紊乱。在这一过程中，经济分层的加剧与村庄公共性的消解对农民面子观的影响尤其明显。

##### （一）村庄经济分化与农民面子观的“阶层性”

传统中国农村，主导性的社会结构是血缘和地缘关系，虽然社会也有分化，但是内部阶层关系并未超越血缘地缘关系。然而，近 20 多年来，经济分化成为社会结构变迁非常重要的一维。<sup>①</sup> 一些地区的经济分化已造成了对传统农村社会结构的解

①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农村社会分化开始明朗化、清晰化，相关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有：陆学艺、张厚义：《农民的分化、问题及其对策》，《农业经济问题》1990 年第 1 期；万能、原新：《1978 年以来中国农民的阶层分化：回顾与反思》，《中国农村观察》2009 年第 4 期；毛丹、任强：《中国农村社会分层研究的几个问题》，《浙江社会科学》2003 年第 3 期；张谦：《终结的开始？——当代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和农民阶层的分化》，《中国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年；陈柏峰：《土地流转对农民阶层分化的影响》，《中国农村观察》2009 年第 4 期；陈柏峰：

构：阶层关系肢解血缘地缘关系。

在苏南农村，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开始出现贫富分化。就在这一时期，苏南农村普遍掀起了攀比建楼房的高潮。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农民间的经济分化进一步加剧。20世纪90年代末，苏南农村开始有人建造第二代楼房，但这一轮建房却并未形成一哄而起的竞争态势，而且建房与否并不证明建房者的经济状况的好坏。进入21世纪，村里的有钱人都普遍在城里买房，基本不再有在村里建房的需求和动力。可以说，现在建房与农民个人的面子的正相关关系似乎已经解除。原先躁动不安，不服不平的人们都日渐“各就各位”了——大家都逐步接受了这个无法改变的现实，被动地接受了自己的身份归属。

其实，在今天的苏南农村，不仅是建房，几乎所有的私人消费，都不再像过去、也不像其他地区那样会关乎农民的面子。究其原因，除了这里经济上已经属于“丰裕社会”，横向的社会关联上具有较强的个体化、原子化特征以外，阶层分化的成熟稳定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不同阶层的人都产生了自己的阶层意识和身份归属。这种情况下，同一个社区里虽然可能还在共享同一套面子观，但是，各个阶层已经形成了自己具体的标准和内容，尤其是在与经济相涉的面向的评价上。

阶层分化使得私人性的消费不再直接关乎面子，但是，在人情往来这种具有公共性的消费上却需另当别论。人情具有互惠、建构与维持社会关系的重要功能，即使出现了经济分化，但是生活在同一社区里的人仍然保持着人情往来。人情交往中，礼金和酒席花销对于交往的双方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且双方之间的往来必须保持基本的平衡——无论是礼金的数额还是酒席的档次。结果，在苏南这样的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分化的出现使得高收入者推动着礼金数额和酒席档次不断攀升，他们成了轻松的领跑者。为了维持原有的社会关系，保住既有的面子，村庄里的中低收入者不得不疲于奔命，背负沉重的人情负担，心痛于操办酒席时的巨大浪费。

在很多地方，无论负担多重，经济条件差的村民都不会降低礼金数额和酒席档次，因为人情交往中的平衡直接关乎自己的面子。最终，这些人不得不通过减少人情往来，缩小交往圈，来维持人情交往的平衡和保证酒席的档次，从而维护住最后的面子。仪式性人情越来越成为村庄富裕阶层和小康阶层的“表演”和面子展示，中等收入群体可以勉力参与，低收入群体则只能退出。人情和面子竞争越来越成为村庄经济分化的社会确认方式。

由此可见，阶层分化对农民面子观的影响非常复杂。在涉及私人消费，对私人

---

《中国农村的市场化发展与中间阶层》，《开放时代》2012年第3期；杨华：《当前我国农村社会各阶层分析》，《战略与管理》2010年第6期；林辉煌：《江汉平原的农民流动与阶层分化：1981—2010》，《开放时代》2012年第3期。尽管这些成果间存在着观点的分歧，但是有两点是共识性的：一是都承认农村已经存在明显的经济分化；二是都意识到这种分化已经产生了相应的社会后果。

能力与成就的面向上，经济分化使得不同的阶层形成了不同的面子标准，人们往往按照具体的阶层标准来要求自己、评价别人，从而使得面子具有了明显的“阶层性”。同时，在这个快速变迁的社会里，不同阶层的标准也一直处于变动之中，变迁的方向和内容则是由社会上层所引领；正是通过引领面子观的变迁，社会高收入群体客观上实现了对低收入群体的“文化侵略”。在涉及具有公共性的人际交往中，农民面子观也正在发生变化，各阶层虽然仍在其中激烈竞争和展演，但经济分化使村庄的人际交往出现了某种断裂，阶层关系日益切割原有的地缘和血缘关系的组合。传统的血缘与地缘关联越薄弱，“原子化”程度越高的地方，这种切割就越明显。

## （二）社区公共性的消解与面子观的金钱指向

当前，大规模人口流动使村庄门户大开，村庄社会关联日益变弱，社会的“原子化”或曰“个体化”正在村庄社会兴起。随着农民大规模外出务工，村庄社会门户大开，流动性日益增强，无论在生计模式还是在社会交往与价值观层面，农民都正在大规模挣脱土地的束缚。这种结构性的变迁，使得“家庭的主要功能从一个为了集体生存而奋斗的法人群体演化成为个体成员提供幸福的私人生活港湾”。<sup>①</sup> 市场化的浸入、社会分层的加剧，正使得农民之间的互助互惠行为大为减少，依存度下降，村庄社区这个守望相助的生活共同体、文化与价值的共同体，其公共性也逐步衰微，甚至趋于解体。

村庄共同体的松解，公共性的衰微，使得其价值生产与维持能力也随之衰退，原先的“小传统”逐步被当下流行的“大传统”不断地吞噬消解，面子的指向性和标准也随之改变。随着个体主义不断张扬，越来越多的村民不再依据原有的文化观念与价值体系追寻自身的社会性价值，他们的个体效能感和社会声望获得更多地为外界流行的价值观念、流行时尚所左右。由是，品性与德望对面子的维持便越来越不重要，与之相应的是金钱财富的重要性迅速上升：无论钱的来路，无论是不是为富不仁，有钱就是风光。<sup>②</sup>

村庄熟人社会是一个差序格局的亲密社群，每个个体都是编织在这个浓密厚重的社会关系网中的节点，是关系网中“社会关系的总和”，“这网络的每一个结都附着一种道德要素”。<sup>③</sup> 因此，地方性道德伦理所规约的公序良俗在面子观中的权重和排序非常重要。当人们日益个体化，脱嵌于村庄共同体后，市场经济中一切价值的公分母——货币便越来越成为评判面子的核心标准，金钱剔除了社会个体的个性，剔除了具有人格特征的社会关系，将人们从传统面子观的“羁绊”中“解放”出来，

① 阎云翔：《中国社会的个体化》，陆洋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第11页。

② 相关研究参见谭同学：《桥村有道》，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

③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6页。

使得面子的价值指向性日益趋向于金钱财富。

当然，由于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演变还处在一个正在进行的过程中，传统的联结模式与新的联结因素激烈交汇，一种新的相对稳态的社会结构并未成型。因此，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分析农民的面子观的转变，目前也只能是一个开放性的命题，面子观对新时期村庄社会秩序的影响机制也仍然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 五、面子的社会治理功能

因为面子是“社区性货币”，所以只有在具有身份归属的时空坐落里人们才会在乎面子。而当人们都在乎面子时，面子就能产生有效的社会治理功能。这种社会治理机制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作为“社区性货币”的面子，通过正向的褒誉机制和负向的排斥机制来实现社会治理。“社区性货币”丰厚的人，能从村庄社会中获得很高的声望评价和更多的互助合作，他的生活会愈发地便利与有意义。这样的结果会激励人们更积极地参与社区互动，服膺公共规则。这是一种正向的激励与控制。而“社区性货币”贫乏，没有“脸面”的人，则会招致大家的鄙视，被社会边缘化；对于表现极端的人，人们甚至会拒绝在生产生活中与其合作互助，过度的社会排斥会使其“社会性死亡”。这样的排斥机制对世代生活在村庄社区里的成员来说非常有威慑力。

在传统中国农村的理想类型里，人们的经济状况也会影响面子的大小，但这种影响是有限的。无论是褒誉机制还是排斥机制，往往主要取决于人们的道德评价。例如，村庄道德的越轨者会丢失面子，从而丧失威望，甚至被排斥在村庄社会关系圈之外。那些道德有瑕疵的村民，面子小，人情关系往来少，公共事件中的出现频率就低，逐渐就成了严重缺乏社会关系的“死门子”。<sup>①</sup>在特殊场合，这种排斥甚至会导致实在的惩罚。<sup>②</sup>由此，村庄地方性规范可以得以维护，面子的社会治理功能也因而凸显。

第二，这种社会治理作用于日常生活的各个微观领域。在面子机制下，一个相对稳定、封闭的村庄社区，其实就是一张无所不包的微观权力关系网。每个成员都对他人享有权力，也受他权力的制约；每个人都是这个控制的实践者、承担者、承受者和维护者；每个人都时时能感受到制约者的“身体在场”。

- 
- ① 阎云翔在调研中发现，村里不孝敬老人的农户在办白事时，村民会通过不去人情仪式现场或只作短暂停留等方式来表达他们的不满。（阎云翔：《礼物的流动》，李放春、刘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1页）
- ② 在湘南水村，一场水灾来临时，村民才以拒绝救助的形式惩罚了一个道德越轨者，他多次伤害本村利益，在村中毫无面子可言。（杨华：《初论“血缘共同体”与“关系共同体”》，未刊稿）

这种相互制约的权力是弥散的、长久的。每个人既是主体，也是客体，大家都是权力的作用点。甚至可以说，这就是一张没有主体的微观权力之网，这张微观权力关系网发挥着强大的村庄社会治理功能。日常的生产生活、言行举止、为人处世，它无一不管，甚至常常将触角超越公共领域而进入个体的私人领域。比如“好吃懒做”，虽不会给社会、他人带来直接的损害，但是面子机制仍将其纳入控制范围。同时，村庄舆论、集体记忆的存在，还使得每个成员很久远的劣迹，甚至是其祖上的劣迹都可能会随时被人提起，这逼迫、提醒着人们得一直遵守社区规范，长期自律。

第三，面子是一种积极的、低成本的控制机制。法律维护的是最低层次的道德，而面子建构的则是较高标准的规范。公序良俗、良好的社会生态，是社会秩序形成的基础，因此面子这种控制机制维持着社会良性运转的根基。

面子的标准、规范为成员所普遍的内化、服膺，即费孝通所谓的“从俗即从心”，社区成员普遍存在着对规则的认同和规则的信仰。这种控制机制在不断自我执行和规训，同时也规训他人；是一个一切人自我规训、监督一切人的机制；甚至是一个将规则逐渐内化为大多成员行动的身体无意识的机制。因此，面子还是一种成本低、稳定性高的控制机制。

在理想状态下，面子作为一种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的复合体，能起到很好的社会控制作用，并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与民众的福祉。千百年来，以血缘和地缘为社会结构主导的中国农村，正是得益于面子的社会控制功能，使村庄社区性规范和价值得以维持和再生产，在弱国家控制的情形下实现了村庄的自我控制和自主治理。而当下中国农村的社会变迁必将使得面子这种软性社会控制机制趋于乏力。当没有了面子这种村庄社会控制手段时，村庄的秩序还能继续有效维持吗？

今天的中国农民，正在逐步挣脱土地的束缚和社区的管约，直接面对现代国家的普遍性规则。现代政治不似传统的乡村政治那样关注人心的德性，也无权惩治人心中罪恶，只能从制度上做种种安排和规定，最大程度理性化地防范可能出现的各种不幸。尽管现代国家机器日益强化，但是仅凭它却很难真正达至对个人精神、价值的濡化，无法做到对人心的规约。

面子即人心，人心即政治。中国农村的现代性变迁使得农民的面子观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人们在多元文化的冲突中，在纷至沓来的利益诱惑面前焦灼不安，无所适从；人们突然变得无法定义自己，无法定义与别人、与社会的关系了。面子需要重新定义，人心需要重新安顿。在此过程中，扬弃面子的负功能，使其与现代社会结构匹配、与现代文化接轨自是题中应有之义。面子如何定义，人心如何安顿，这是崇尚个人自由和权利的现代性留给我们的时代难题。

〔责任编辑：李凌静 责任编审：冯小双〕